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老年流动人口群体细分及特征识别研究

陈娟¹,徐远远¹,王雨濛²

(1.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205;
2.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 随着新型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深,老年流动人口已经成为我国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老年流动人口进行群体细分和特征识别,有助于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以为其提供更优质的社会保障,协助其更好地适应城镇环境。结合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LCA模型对老年流动人口进行群体细分与特征识别,并构建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找寻影响不同类型老年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因,为更好满足其流动需求提供依据。研究发现,可将城镇化背景下的老年流动人口细分为3类:(1)“代际交换型”,多以农村高龄、健康状态不佳且家庭整体收入水平不高为主要特征,属于3类流动老年人口中最弱势群体,基于代际之间的互惠互利而发生的流动迁移。(2)“经济驱动型”,多以农村低龄、健康、家庭子女较多为主要特征,属于3类流动老年人口中就业创业意愿最强群体,绝大部分基于外出务工或经商的原因而流动。(3)“情感依赖型”,多以城镇受教育水平和家庭经济水平普遍较高为特征,属于3类流动老年人口中追求情感富足意愿最强的群体,基于养老考虑随子女一起流动。提出应从保障经济驱动型老年流动人口的就业参与、加强代际交换型流动老年人口的社会支持、完善情感依赖型老年流动人口的养老服务等方面提升其社会保障水平。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 老年流动人口; 群体细分; 潜分类模型

中图分类号:C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25)04-0117-12

DOI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25.04.011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1],其目的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分享现代化的成果^[2]。新型城镇化以让人民获得福利和幸福为目标,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实现人的城镇化,流动人口市民化是人的城镇化的重点内容^[3]。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2020年全国有超过1/4的人口处于流动状态^[4],老年人在流动人口中的比例持续增长,数量为3327.25万人,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相比,总数增加了2392.9万人^[5]。然而,受多方面因素制约,流动老年人口难以享受城镇化的红利,成为了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弱势群体。

现有研究发现,受年龄、个体认知、文化程度、家庭收入水平、健康状况、代际支持程度、户籍制度等多因素影响,老年流动群体对流入地的认同感、融入感和安全感等不足,存在社会融入问题^[6]。此外,由于户籍身份的差异,老年流动人口也难以享受与当地户籍人口相同的社会保障。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社会化程度的加强、家庭结构的变化、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老年群体流动迁徙的原因和决策依据呈现更加多元性、异质性。部分老年群体的流动从被动在乡一城、城一城之间发生移动^[7]到为享受更加优质的服务、选择适宜的养老城市而进行主动流动^[8],从更多依赖子女、家庭养老到代际互惠、自我就业、追求高品质康养。如何合理地分配资源,满足老年流动人口的需求以改善老年流

动人口福祉,促进老年流动人口逐步融入城市引发了广泛关注。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健全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8]。在此背景下,本文聚焦我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老年流动人口,对其进行群体细分和特征识别,分析个体在不同阶段的迁移行为特征与需求以及家庭结构、资本与差异化价值需求对流动行为的影响,以明确我国老年流动人口的生存现状与流动需求,便于政府在城镇化背景下为其提供针对性的社会保障,并有利于未来充分开发利用低龄老年人力资源,突出健康、参与、保障等积极老龄化理念,进一步完善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

一、文献回顾

1.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老年流动人口的需求与问题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以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9]。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1]。新型城镇化强调民生、可持续发展和质量三大内涵^[10],在原来关注城镇化率的基础上更加关注城镇化的质量,在不牺牲农业和生态的基础上提高农村人口在城镇的滞留率,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因此,它不仅仅是“人口的城镇化”,更应是产业、人口、空间、社会四位一体的城镇化^[11-13],旨在实现城市建设在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上的均衡发展^[6]。李强等指出“人的城镇化”既包含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也含有文明素质的形成和社会权益的保证^[14]。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必须始终把人的需求和利益放在首位,处于弱势地位的老年流动人口的需求和利益更应如此。

有文献认为,现行户籍制度和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制约了社会权益的实现,限制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16-17]。长期的城乡二元户籍限制,农村老年流动人口进城后难以充分享受当地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福利,更多依赖子女、家庭养老^[18-19]。即便是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流动老年人口,由于缺乏对城镇公共资源使用知识和方法的了解,无法适应城市的信息化生活方式,其就业机会有限,流动老年人口在流入地的经济需求也难以满足。此外,受制于年龄与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弱势,在城镇化进程中,大量老年流动人口,特别是从农村流入城市的老人对流入地的群体认同感、在流入地工作、生活所获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等情感需求难以满足^[13,20]。由此可见,由迁移引起的老年人口再分布对老年人需要的健康照顾和社会服务等资源配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1]。大量老年流动人口对流入地就业岗位、医疗资源以及公共服务资源的需求加大,对资源承载能力也是一种考验,甚至可能波及整个社会服务体系。所以,尽管老年流动人口有较高的长期居留意愿^[22],老年流动人口的城镇化依然艰难。

为了有效应对这些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完善老年流动人口的劳动就业及医疗健康方面的保障,以促进其转移,帮助他们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改善其生活状况。陈英姿等认为应努力解决老年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提高住房保障^[23];熊萍等认为应采取有效措施方便社区机构贯彻落实流动人口健康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4];吴迪等认为应提高老年流动人口的健康意识,让其切实享受免费公共卫生服务^[25]。面对流入地人口结构的变化、公共资源紧张、不同类型老年流动人口的差异化需求等问题,政府该如何分类引导、有效应对则需要更详实、准确的研究结果作为依据和参考。

2. 老年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

老年流动人口兼具“老年”与“流动”的双重属性。第七次人口普查中将流动人口定义为“离开户籍所在地的县、市或者市辖区,在异地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26]。学界往往依据年龄对流动人口进行划分,将60岁视为老年的起始年龄^[27]。基于此,本文将老年流动人口定义为年龄在60岁以上、由不同原因所驱动的、离开户籍地6个月及以上的人口。已有研究显示:当前我国老年流动人口年龄相对较低,主要集中在60~69岁这一年龄段^[28],受教育程度较低^[29],多为农业户口^[30],并具有以下特征。

(1)从流动目的来看,老年人口倾向于从农村地区流向城镇,以获取更多就业岗位或者方便照顾在城镇工作的子孙等,可划分为务工经商型^[27]、照顾子女型^[31]。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主要从事基层服务工作,如保洁、保安、个体经营等。

(2)从流动方向来看,大多数老年人为跨县流动^[32],呈现出流入地空间聚集特征。他们更愿意迁移到北京、上海和广东等经济发达大城市,形成具有明显特征的京津冀、长三角流入聚集地带^[29]。其流动主要呈现出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的特征,与我国劳动力迁移流动的趋势基本一致。

(3)从群体收入与医疗状况来看,老年流动人口人均收入远低于其他群体,由于在流入地的就业和医疗健康方面得不到保障,健康档案建立率和健康教育接受率均很低^[33-34]。但也有部分经济条件较为优越的“候鸟老人”,为了追求高质量的异地养老或旅居养老而流动,其在流入地的长期居住意愿也较强。他们会根据气候的变化,像候鸟一样北上或者南下,以寻求适宜的居住地,如三亚、海口等地区聚集了许多北方地区退休的老人。

(4)从受教育程度来看,老年流动人口区域差异明显,在部分经济较发达地区(例如北京市)流入的老年人口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且主要为非农业户口,以养老、支持子女为主要目的,这与我国老年流动人口整体特征有所不同^[35]。

(5)在市民化意愿上,老年流动人口有着较强的长期留居意愿和相对较弱的迁户意愿^[22],且伴随着年龄增长,长期留居意愿更加强烈^[36]。具体来说,养老型老人长期留居意愿较高^[37],照顾子女型相对较低,而工作机会是务工经商型老人长期留居的首要考量,老年农民工有强烈的返乡意愿^[38]。

3. 老年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国外老年人口流动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即居住环境^[39],社会联系^[40],养老服务^[41]以及经济条件^[42]。研究表明,在国外,个人收入和健康状况是影响老年人迁移的重要因素,其中拥有高收入或者低收入的老年人口更有可能发生迁移。迁入地的种族相似性、休闲场所状况和地域差异等因素均会对老年人口的迁徙产生影响^[43],亦有研究提出,地区税收和政府支出等财政变量对老年人口迁移具有影响,研究认为美国老年人口偏爱向低财产税、低遗产税、高所得税和销售税下调的地区迁移^[44]。国内研究表明,我国老年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大致包括个人因素、家庭因素、社会环境因素等。老年人的性别、年龄、健康状况、经济收入、户籍等个人因素会影响其流动。研究表明,年龄越低、身体健康状况越好的老年人更容易流动^[45],其中男性的迁徙率明显高于女性^[29]。经济水平低是促使老年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农村老年人口普遍缺少经济支持,他们更容易因外出务工而发生流动^[45-46]。家庭因素是导致老年人口转移的主要原因,成年子女的迁移会极大地带动老年人口随之流动。迁徙老年人口的家庭因素,如儿女具备较高的素质、有一定的经济保障^[31]、老人对子女依附感较强以及家中有婴幼儿急需照料等^[45],都是促使他们流动的重要原因。社会环境是影响老年人口流动的重要宏观因素。随着经济发展的加快,我国老年人口仍然倾向于迁往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28]。尤其是农村户籍老年人口,他们更容易受到经济收入、环境因素的影响,更倾向于迁往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45-46]。由于我国老年流动人口规模庞大,个人、家庭情况不同,经济状况、文化程度等方面也相差甚大,流动动因与需求各异,分类找寻影响老年人口流动决策的因素才能更准确有效地提供社会服务和综合保障,但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上述研究对老年流动人口的特征及其流动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但仍有待完善。本文结合人口迁移相关理论,引入LCA模型,从群体画像入手,对我国城镇化背景下的老年流动人口进行群体细分和特征识别,并运用多元无序Logistic回归模型从个体、家庭特征与流动动因等多维视角剖析影响不同群体老年人口流动意愿和决策的主要因素,分析该庞大群体内部异质性和迁移动机的多元性。

二、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1. 理论假设

受城镇化建设影响,老年流动群体流动动机不一。鉴于老年流动人口的多样性、流动原因的多元性,为了更好地分析不同类型老年人口的流动特征,本文从人口尤其是老年人口流动动因与决策依据的核心理论与研究假设入手。

(1)生命周期中不同阶段的老年人口迁移的理论渊源。生命周期理论诠释了个体和家庭的生命周期或者生命事件会影响老年时的迁移决策和行为,并强调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人口的流动呈现不同特点。老年人口迁移的生命周期模式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退休年龄较早或依然有较好体力的农村老人,具有低龄、生活可以完全自理等特征,通过向城市流动承担一些工作并进行劳动力市场参与^[31]。然后,进入中高龄阶段,老年人口向成年子女或者其他亲属迁移,从事帮助子女照料孩子等工作,支持子女工作使得家庭获取更高经济利益是促使老年人流动的重要原因。最后,进入养老阶段,该阶段老年人口往往处于高龄或生活自理能力严重丧失,无法继续工作或支持帮助照料子女家庭。研究表明,身体素质越好、低龄的老年人选择流动可能性更大^[46]。因此,基于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老年人的年龄、健康状态以及对子女依赖程度会影响其流动动机,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_{1a}:在老年人生命阶段的初期,低龄流动老年人口更可能为了务工经商而流动。

H_{1b}:在老年人生命周期的中后期,中高龄流动老年人口更可能为了帮助子女或满足养老需求而流动。

(2)个人决策与家庭决策混合视角的新经济迁移理论、家庭决策理论分析。随着城镇化带来的经济模式和组织关系的转变,关于老年人口的迁移问题,传统的迁移理论更多地强调个人在迁移决策中的主导作用,而新经济迁移理论突出家庭与个人可通过迁移实现利益最大化目标。这一观点的转变,充分体现了在城镇化战略实施背景下,受家庭本位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广大农村居民迁移的考虑要素不断增多,从单一考虑经济利益向兼顾家庭资本积累、协调家庭关系、关注家庭人力资源安排转变,迁移决策从个人的经济因素考虑到整个家庭经济与非经济因素的综合考虑^[33,41]。家庭收入低、缺乏经济保障是相当部分老年人选择流动的重要因素,由于农村老年人口普遍缺少经济支持,他们更容易因外出务工而发生流动^[45-46]。结合我国老年人口流动的数据资料和相关学者的研究观点,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_{2a}:老年人家庭资本积累较少,更可能为了务工经商或帮助子女而流动。

H_{2b}:农村老年人更可能为了务工经商而流动。

(3)家庭物质、精神双向需求的代际交换理论的解释。社会交换理论强调人与人之间在充分权衡利益和损失时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而家庭作为一个有血缘关系的群体,会更加注重物质和精神上的双向交流,在迁移流动时会优先考虑家庭成员互惠和代际支持的策略选择,在照顾与被照顾、支持与被支持、给予与获取方面形成双向的需求,同时老年人自身的素养、对子女的情感依赖程度、家庭整体收入水平也会影响其流动决策的选择^[33,41]。成年子女的迁移会极大地带动老年人随之流动,如子女综合素质高、具备一定的经济保障^[31]、老人生活对儿女的依附程度强以及因工作家中需要老人提供照顾帮助等^[45],都是促使他们流动的重要原因。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_{3a}:老年人主要被家庭成员供养,更可能为了满足养老需求而流动。

H_{3b}:城镇老年人更可能为了满足养老需求而流动。

2. 基于LCA的老年人口流动细分模型构建

(1)模型选择。潜类别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 LCA)模型是建立在概率分布原理与对数线性基础之上,引入因子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的思想而形成的,是一种揭示数据中隐藏分组的方法^[47]。近年来, LCA方法普遍适用于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模式^[48]、居民健康生活态度与行为^[46]以及老年人养老需求方面^[4]。其优势在于:1)可以判断类别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即分类是否有意义;2)避免人为样本细分中分界点的确定较武断的弊端。该模型适用于分析我国老年流动人口异质性特征,对群体进行分类。

(2)模型构建。LCA的目的是确定当外显变量之间关系被完全解释时,潜变量类别 t 的最小个数。通常先拟合一个不分类即 $T=1$ 的基准模型,如果拟合度不好,则进一步拟合2分类($T=2$)、3分类($T=3$)模型……每次增加一个类别,直到能够提供足够拟合度的模型出现^[49]。

本文构建LCA模型对调查样本进行人群细分。假设有3个外显变量(计数资料) A 、 B 、 C 每个变

量的选项数分别为*i*、*j*、*k*;同时在外显变量之后还存在具有*T*个潜类别的潜变量*X*。基于模型的基本假设(在考虑到了潜变量之后,各个外显变量在统计学上是独立的)可得到LCA模型的基本方程(式1)。式中 π_{ijklm}^{ABC} 表示一个潜类别的联合概率, π_i^x 则表示观测数据属于某一潜变量*X*的特定潜类别概率,且潜变量的各类别概率之和为1。 π_{it}^{Ax} 为条件概率,表示当外显变量*A*=*i*时,调查对象属于潜类别*t*的概率。 π_{jt}^{Bx} 、 π_{kt}^{Cx} 以此类推。

$$\pi_{ijklm}^{ABC} = \sum_i^T \pi_i^x \pi_{it}^{Ax} \pi_{jt}^{Bx} \pi_{kt}^{Cx}$$

(1)

3. 影响老年人口流动类别的多元无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

在采用LCA模型对我国老年流动人口进行潜分类的基础上,本研究需要对不同类别的老年群体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识别,对比其异质性,为后续政府分类制定相应的社会保障政策提供依据。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是一种处理多个分类因变量的统计分析方法,由于因变量老年人口流动类别不具有等级关系,因此采用无序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假设有3类流动老年群体*a*、*b*、*c*,以*c*类作为比较基准,建立以下回归模型:

$$\text{Logit}P_a = \ln \left[\frac{P(Y=a|X)}{P(Y=c|X)} \right] = \alpha_a + \beta_{11}X_1 + \dots + \beta_{1p}X_p$$

(2)

$$\text{Logit}P_b = \ln \left[\frac{P(Y=b|X)}{P(Y=c|X)} \right] = \alpha_b + \beta_{21}X_1 + \dots + \beta_{2p}X_p$$

(3)

三、研究设计

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最近一期的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对象为“在流入地居住1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5周岁及以上(即2003年4月及以前出生的)流动人口”。本文选取年龄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样本进行研究,该部分有效样本为7202户,数据包括流动人口及家庭成员、流动范围和趋向、就业和社会保障等信息。

2. 变量描述

参考相关文献^[4],最终提取如下变量,变量选取及主要特征见表1:

表1 变量选取及主要特征			N=7202	
变量	变量含义和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性别	男=1;女=2	1.418	0.493	
年龄	60~69=1;70~79=2;80岁及以上=3	1.266	0.515	
受教育程度	未上过学=1;小学=2;初中=3;高中=4;大学专科=5;大学本科=6;研究生=7	2.676	1.172	
户口性质	农业=1;非农业=2	1.411	0.492	
身体状况	健康=1;不健康=2	1.181	0.385	
婚姻状况	有配偶=1;无配偶=2	1.150	0.357	
亲生子女数	一个及以下=1;两个=2;三个及以上=3	2.329	0.605	
流动动机	务工工作=1;经商=2;家属随迁=3;婚姻嫁娶=4;拆迁搬家=5;投亲靠友=6;异地养老=7	3.088	2.042	

(1)因变量。根据潜类别将老年流动人口细分后,选取不同类别老年流动人口作为因变量,进一步构建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不同类别老年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

(2)自变量。自变量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个人因素,主要通过性别、年龄、户口性质、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进行测量。第二类是家庭因素,通过子女数量、婚姻状况进行测量。第三类是流动动机,通过务工工作、经商、家属随迁、拆迁搬家、投亲靠友异地养老进行测量。根据表1对老年流动人口的自变量名称、类型、赋值及样本中的分布可知,被调研的大部分老年人的年龄分布在60~69岁左右,迁徙的老人最高年龄是89岁;调研的迁徙老年人中,男性多于女性。样本中老年人的教育程度集中分布在未上过学与初中之间。样本中迁徙老人的子女数量分布比较平均,农业户口性质的老年人多于非农业户口性质的老年人,迁徙原因集中于家属随迁和务工,占比高达67.3%。

四、实证分析

1. 基于LCA的老年人口流动群体划分

为了更加明确刻画老年人口流动群体的特征以及差异性,运用LCA模型构建潜在变量和外显变量的统计数量关系。潜在变量通常是指不能被直接精确观测的指标,而外显变量可以被直接观测并进行统计。恰当的外显变量需具有相互独立性、可观察性。

结合数据类型,本文选取的老年人口样本年龄为60岁及以上。为全面考虑不同个体的户籍属性和类别、流动方式、流动后想要实现的目标以及老年流动群体在流入地的心理变化与保障程度等方面,选取老年人的户籍所在地、离开户籍地时间、对流入地居住感受、身体状况、家庭经济困难状况、参保情况作为外显变量,将所选择的外显变量重新编码为二分类变量。具体而言,将“非农业户口、离开户籍地时间小于10年、愿意融入当地、身体健康、经济收入小于支出、已办理社保卡”老年流动人口赋值为1,否则为0。由于本文选取6个外显变量,利用LCA模型分别拟合5个潜类别的模型(原则上,潜类别的个数要小于外显变量的个数),表2展示了各个潜类别模型的统计量。在这些统计量中,艾凯克信息准则值(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AIC*)和贝叶斯信息准则值(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 *BIC*)是衡量模型拟合度效果最常用的两个变量,这两个变量数值越小表示模型拟合度越好^[47-48]。徐晓雯等^[4]、刺媛媛等^[49]研究表明在判定最优潜类别模型上, *BIC* 检验法比其他似然比检验法更具优势,尤其是在大样本情况下。表2中拟合结果表明:当潜类别个数为1~5个时,均呈现出 *BIC* > *AIC*。当潜类别数为3时, *BIC* 达到最小值,此时 VLMR—LRT、BLRT 的 $p < 0.05$, 评估分类的精确程度的信息熵值位居第二(通常情况下,该指标越趋向于1,就越能表明这一模型与数据之间的契合度越高^[47])。上述结果表明,将老年流动人口划分为3类时模型最优。

表2 LCA模型的拟合优度 N=7202

类别	艾凯克信息 准则 <i>AIC</i>	贝叶斯信息 准则 <i>BIC</i>	罗蒙代尔鲁本校正似然 比 VLMR—LRT	基于Bootstrap的似然比 检验 BLRT	信息熵	类别概率/%
1	39316.834	39358.127	0.000	—	—	100
2	38879.567	38969.038	0.000	0.000	0.396	13.0/87.0
3	38797.351	38934.993	0.000	0.000	0.560	10.7/77.6/11.7
4	38794.949	38980.766	0.178	0.064	0.600	11.7/0.1/9.3/78.7
5	38804.878	39038.870	0.398	1.000	0.509	47.3/16.6/0.3/15.3/20.5

2. 不同类型老年流动人口的特征描述

潜类别模型拟合结果显示,老年人口流动群体可分成3类。表3显示每一潜在类别与6个外显变量间的关系及概率构成。外显变量概率表明了某种类型老年流动人口的该种倾向,可以据此对老年流动人口3种类型的特征做出简要的概括。如结果所示,样本数量7202个,其中3个类别老年流动群体占比分别为10.7%、77.6%、11.7%。3种类型“对流入地感受”的条件概率均很高,表明老年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整体感受较好,认同感较高。类别1中“家庭经济困难状况”条件概率偏高(0.571),表明其经济状况整体较差。类别2中各项变量条件概率处于中间水平,整体健康水平、参与保险程度较好。类型3中的户籍和参保情况的条件概率较高,表明该类老年流动人口均为城镇人且已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同时家庭经济困难状况不明显。

为了进一步识别各类别的老年流动人口特征,本文对3类老年流动人口的个人、家庭及迁移特征

表3 3个潜在类别各外显变量的条件概率

类别	家庭经济困难状况	离开户籍地时间	健康 状况	对流入地感受	老家 户籍	参保情况	潜在 类别概率	样本量
类别1	0.571	0.195	0.327	0.958	0.056	0.199	0.107	770
类别2	0.009	0.505	0.877	0.950	0.036	0.514	0.776	5586
类别3	0.021	0.547	0.888	0.956	1.000	1.000	0.117	846

进行描述,根据关键指标值绘制了3组样本的特征示意图如图1和图2。由图可知,老年流动群体在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与流动动因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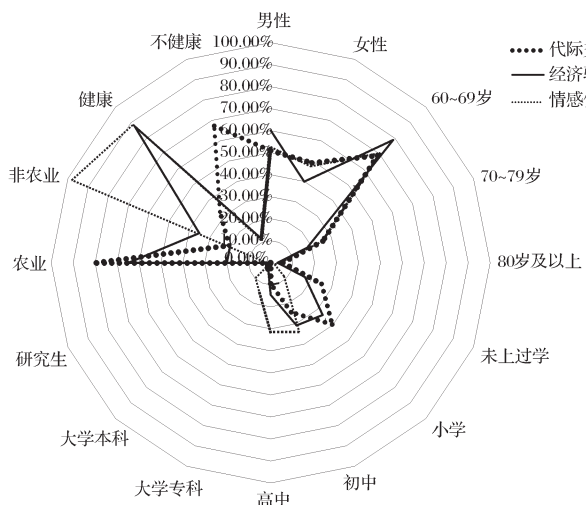


图1 依据个人特征指标的3种类型
老年流动人口概率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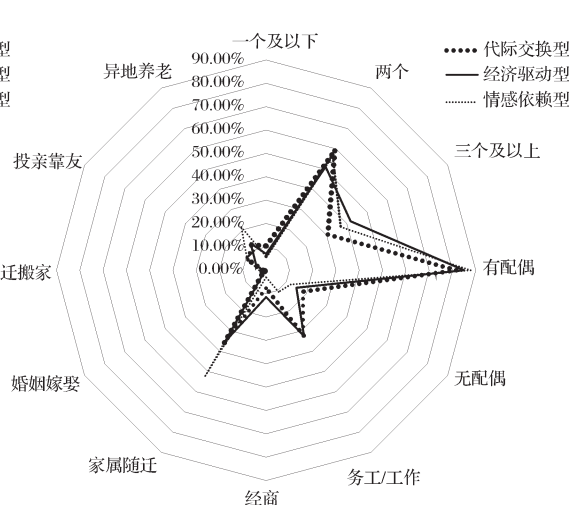


图2 依据家庭与迁移特征指标的3种类型
老年流动人口概率分布

第一类为“代际交换型”老年流动群体。个人特征方面,这类群体男女性别比例基本持平,年龄集中在70岁以上,学历最低,主要为农业户籍,大部分伴有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对子女的依赖和被关照需求较强烈,是最弱势群体。家庭特征方面,该类老年流动群体拥有一个及以下子女的人数在3类中占比最大。流动原因方面,家属随迁和务工所占比例较高,而异地养老所占比例较其他两类最少。集中表现为被动跟随子女一起向城镇流动的中高龄农村老年群体,家庭储蓄较少、资本积累不足,提高家庭人力资源数量和收入水平是其决策的主要依据。此时,家庭内部通过衡量不同成员的劳动能力,让所有成员参与代际分工,以提高家庭的整体利益。为减轻家庭负担,老年人口会选择继续劳作,给子女提供代际支持,以增加子女的劳动力市场参与,或者自己外出务工,以促进家庭资本积累。综上, H_{1b} 、 H_{2a} 得到验证。

第二类为“经济驱动型”老年流动群体。个人特征方面,这类群体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年龄多集中在60~69岁这一年龄段。学历集中于小学、初中,部分学历为高中,整体的学历水平偏低但高于第一类。该类流动群体也主要为农业户口,但非农业户口的人群多于第一类,且大部分身体状况都处于健康水平,属于3类流动老年人口中就业创业意愿最强群体。家庭特征方面,这一群体拥有的子女数量主要集中在两个、三个及以上,拥有一个子女的占少数。流动原因方面,务工与家属随迁占比较高,且务工、经商人数占比在3类流动群体中最多。由此, H_{1a} 、 H_{2b} 得到了印证,即因务工而流动的老年人通常为低龄农村老年群体,他们大多数身体健康,还能承担各种工作并继续参与劳动。因此选择流动到城镇进行务工或经商,以获得更高的家庭资本积累。

第三类为“情感依赖型”老年流动群体。个人特征方面,这类群体男性占比稍微高于女性;年龄集中在60~69岁这一年龄段。其学历水平集中于初中、高中及大学,且非农业户籍占比高达98%,大部分身体状况较好,属于3类流动老年人口中学历水平最高群体。家庭特征方面,子女数量集中在两个及以上,极少数拥有一个子女,有配偶的比例较高。流动原因方面,家属随迁和异地养老所占比例较高,异地养老所占比例较前两类高,且务工经商人数占比为3类流动群体人数最低。这类群体主要为知识水平较高的城镇户籍流动老年人口,且拥有较多的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可以完全依赖子女供养,流动的主要原因是为满足自身的养老需求。他们随子女一起流动以寻求情感依赖,获得精神上的富足, H_{3a} 、 H_{3b} 得到印证。

3. 不同群类型老年流动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前文的潜类别分析结果,构建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各类老年人口流动的因

素进行分析,明确其流动决策的影响因素。具体而言,将影响老年人口流动的老年人个体因素、家庭因素、流动动机作为自变量,将老年流动人口类型作为因变量纳入无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因变量 Y 分别取 1 代表“代际交换型”、2 代表“经济驱动型”、3 代表“情感依赖型”,以“情感依赖型”作为参考组,运算后的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老年人口流动类型的多分类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类别 1:代际交换型(N=770)				类别 2:经济驱动型(N=5586)			
	B	标准误	p 值	Exp(B)	B	标准误	p 值	Exp(B)
常数项	15.106	1.116	0.000		15.537	0.339	0.000	
个人因素								
男性	0.196	0.129	0.129	1.216	0.370	0.091	0.000	1.448
60~69 岁	0.065	0.293	0.824	1.068	0.232	0.223	0.299	1.261
70~79 岁	0.132	0.302	0.662	1.141	0.116	0.231	0.616	1.123
未上过学	-14.192	1.081	0.000	0.000	-13.281	0.321	0.000	0.000
小学	-14.552	1.054	0.000	0.000	-13.771	0.216	0.000	0.000
初中	-15.643	1.05	0.000	0.000	-14.777	0.187	0.000	0.000
高中	-15.76	1.055	0.000	0.000	-14.977	0.189	0.000	0.000
大学专科	-16.833	1.136	0.000	0.000	-15.368	0.213	0.000	0.000
大学本科	-16.798	1.170	0.000	0.000	-16.011	0.000	0.000	0.000
农业户口	4.456	0.279	0.000	86.173	3.810	0.259	0.000	45.146
健康	-2.531	0.154	0.000	0.08	0.124	0.134	0.352	1.132
家庭因素								
(子女数)1 个及以下	0.582	0.315	0.065	1.789	-0.194	0.244	0.426	0.824
(子女数)2 个	0.399	0.133	0.003	1.491	-0.088	0.094	0.349	0.916
有配偶	-0.139	0.239	0.560	0.870	-0.23	0.178	0.196	0.794
务工工作	0.752	0.21	0.000	2.122	0.322	0.153	0.036	1.380
经商	0.793	0.308	0.010	2.211	0.553	0.241	0.022	1.739
流动动机								
家属随迁	-0.043	0.178	0.810	0.958	-0.319	0.113	0.005	0.727
婚姻嫁娶	1.359	0.680	0.046	3.894	0.442	0.569	0.437	1.556
拆迁搬家	-0.497	0.450	0.269	0.608	-0.524	0.268	0.050	0.592
投亲靠友	-0.070	0.252	0.781	0.932	-0.597	0.174	0.000	0.550

从个人因素来看,相较于“情感依赖型”老年流动人口,性别、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身体状况等变量对“代际交换型”“经济驱动型”老年流动人口均具有显著影响,年龄的影响并不显著。其中,“代际交换型”男性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经济驱动型”男性的回归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男性老年流动群体成为“经济驱动型”的可能性是女性的 1.448 倍,这表明男性老年人口更容易偏向于“经济驱动型”。在受教育程度方面,相较于“情感依赖型”老年流动人口,“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这 6 个文化程度变量对其他两种老年流动人口类型的影响均为显著负相关。“受教育程度”变量的参照组为“研究生”,具有研究生学历的老年群体,收入会高于其他文化程度的老年人,他们可以通过给予子女一定经济补贴而免于流动进行代际交换,也会减少很多为获取经济利益而流动的可能,他们成为“情感依赖型”老年人的可能性高于其他两类。在户口性质方面,相较于“情感依赖型”老年流动人口,农业户口对“代际交换型”“经济驱动型”老年人口影响在 1% 水平上显著,农业户口的老年流动人口属于“代际交换型”和“经济驱动型”群体的可能性分别是非农业户口的 86.173 倍和 45.146 倍,也就是说,农村老年人成为“代际交换型”和“经济驱动型”流动群体的可能性更高。在身体状况方面,相较于“情感依赖型”老年流动人口,“健康”变量对“代际交换型”老年流动人口影响呈现显著负相关,“代际交换型”健康老年人口流动的概率比不健康老年人口流动的概率低 92%。而对“经济流动型”老年流动人口,“健康”变量的相关系数为正,可能的解释在于:身体健康的老年人更容易获得就业机会,他们可以通过打工增加经济收入,这一结果与这类群体的特征基本吻合。总体结果表明:相较于“情感依赖型”老年流动人口,低龄、男性、受教育程度低、农业户口、身体健康的流动老年人口更可能成为“经济驱动型”老年流动群体,而男性、中高龄、受教育程度

低、农业户口、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流动老年人口更可能成为“代际交换型”老年流动群体。

从家庭因素来看,相较于“情感依赖型”老年流动人口,拥有子女数量对“代际交换型”老年流动人口具有显著影响。“拥有一个及以下”和“两个子女”变量的回归系数对于“代际交换型”老年流动人口均为正,对于“经济驱动型”老年流动人口均为负,其中对“代际交换型”影响分别在10%以及1%水平上显著。在配偶方面,相较于“情感驱动型”老年流动人口,有配偶这一变量对于“经济驱动型”和“代际交换型”的影响均为负相关但不显著,说明是否有配偶并不是影响老年人流动类型的核心因素。研究表明,相较于“情感依赖型”老年群体,拥有子女数量越少、无配偶的流动老年人口更有可能成为“代际交换型”老年流动群体,也说明子女的迁移会极大地带动老年人口的流动。这也侧面验证了刺媛媛等的研究结论:老年人与子女关系和谐、自身身体状况良好有精力照顾孙辈,亦指引着老年人口流动^[49]。拥有子女数量越多、无配偶的流动老年人口更有可能成为“经济驱动型”老年流动群体,说明相较于“情感依赖型”老年群体,拥有子女数量越多,具有劳动能力的“经济驱动型”老年群体为了减轻子女负担,会选择外出务工经商,对其子女进行反向经济支持。

从流动动机来看,相较于“情感依赖型”流动老年人口,务工工作、经商对“代际交换型”和“经济驱动型”老年群体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婚姻嫁娶对“代际交换型”老年流动人口具有正向影响,且在5%水平上显著,基于婚姻嫁娶原因成为“代际交换型”老人的可能性是基于异地养老原因成为“代际交换型”老年人口的3.894倍;“家属随迁”“拆迁搬家”和“投亲靠友”对经济驱动型老年群体具有负向影响,3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分别在1%、5%、1%水平上显著。结果表明,与“情感依赖型”流动老年人口相比,因务工工作、经商而流动的老年人口更有可能成为“经济驱动型”“代际交换型”老年流动群体。除此之外,因婚姻嫁娶而流动的更有可能成为“代际交换型”老年流动群体。总体结果表明:不同流动动机的老年流动人口会做出不同的流动决策,但均以增加收入、提高生活质量或稳定家庭情感目的为主^[10]。与“情感依赖型”老年流动群体主要为了养老、追求更高品质生活、享受更便利多元的服务而流动不同,“经济驱动型”和“代际交换型”老年流动群体会继续发挥劳动力作用 and 为大家庭继续提供代际帮助,迁移过程的结果往往实现了家庭利益最大化、家庭结构稳定化。

五、结论与建议

1. 结论

本文利用潜类别模型将老年流动人口划分为“代际交换型”“经济驱动型”和“情感依赖型”3类,基于生命周期理论、新经济迁移理论和家庭决策理论、代际交换理论以及LCA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老年流动人口的生存现状与流动需求。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代际交换型”老年流动人口的行为决策主要受家庭因素影响。该群体主要为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中高龄老年人口,拥有子女数相对较少。他们从农村随子女一起流动到城镇,考虑到子女的赡养压力,会通过帮忙照料子孙或者外出务工为子女提供代际支持,以寻求家庭资本积累最大化。

第二,“经济驱动型”老年流动人口主要为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村老年人,以低龄农村男性为主,身体健康状况较好,具有一定的劳动力。这部分群体选择流动到城镇进行务工或经商,以获得更高的资本积累,他们的流动行为更容易受经济因素影响。

第三,“情感依赖型”老年流动人口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主要为城镇人口,拥有较多子女,且能为其提供一定的经济保障。该类老年人对生活品质要求更高,会随子女一起流入养老资源更好的地方,寻求高质量的晚年生活。

2. 建议

根据研究结论及我国老年流动人口的实际需求,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保障“经济驱动型”老年流动人口的就业参与。各级政府创造条件,为经济驱动型老年流动群体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协助他们通过就业获取经济收入,让他们实现老有所为,尽快融入城镇,

并能长久地留居城镇,实现“人的城镇化”^[50]。通过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协同发展城镇化和农村地区经济,不断健全城镇工业体系。多举措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积极拓展就业空间,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市民化,减少老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困难。

(2)加强“代际交换型”流动老年人口的社会支持。建议政府根据其家庭的居住时间、就业状况等为其提供保障,对需要抚养第三代的家庭给予经济补贴,缓解其生活压力。逐步推进户籍改革,缩小城乡二元结构差异,实现社会公共服务的去户籍化,使农村老年流动群体可以享受与城镇户籍老人在医疗保险、公共卫生服务等方面同等的社会保障权益,增加其安全感和幸福感。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提供上门巡诊等医疗服务,设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构建多位一体的医养护理模式,定期为老年人开展心理咨询与医护服务。此外,鼓励这部分老人在闲暇时参与社区活动和志愿服务,发挥他们的经验和技能,帮助这部分老人实现自我价值,提升社会认同感。

(3)完善情感依赖型流动老年人口的养老服务。大力发展社会化和专业化的养老服务,满足流动老年人口的精神需求。调动社区机构的主观能动性,通过硬件设施共享与改造,为社区老年人提供活动场所,为其营造舒适的养老环境。开设兴趣班、组织活动,搭建沟通平台,加强老年人的人际交往、情感沟通与交流,促进外来老年人口的社会融入。对于高龄老年人尤其是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提供家庭养老新模式,依托就近养老服务机构,将专业照护服务送到家中,使其在满足家人陪伴需求的同时,获得专业性的养老照护。

参 考 文 献

- [1] 中国政府网.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公报[EB/OL].(2013-12-14)[2024-11-30].http://www.gov.cn/ldhd/2013-12/14/content_2547880.htm.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EB/OL].(2024-07-28)[2024-11-30].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407/content_69655542.htm.
- [3] 任远.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本质研究[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6(4):134-139.
- [4] 徐晓雯,张秀婷.我国养老需求的潜在类别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LASS数据的实证研究[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22(6):121-128.
- [5] 王桂新,丁俊松.城市规模与流动人口身份认同[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4(2):153-165.
- [6] 李雨潼.中国老年流动人口特征及社会融入分析[J].社会科学战线,2021(3):270-275.
- [7] 新华社.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EB/OL].(2024-07-21)[2024-10-31].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7/content_6963770.htm.
- [8] 新华社.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习近平对“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EB/OL].[2024-12-21].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2/content_6921467.htm.
- [9] 陈明星,叶超,陆大道,等.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理论内涵的认知与建构[J].地理学报,2019(4):633-647.
- [10] 单卓然,黄亚平.“新型城镇化”概念内涵、目标内容、规划策略及认知误区解析[J].城市规划学刊,2013(2):16-22.
- [11] 谢锐,陈严,韩峰,等.新型城镇化对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及时空效应[J].管理评论,2018,30(1):230-241.
- [12] 唐萍萍,任保平.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与政策逻辑[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18-26.
- [13] 人民日报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EB/OL].[2023-12-13].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2/content_6919834.htm.
- [14] 李强,王昊.什么是人的城镇化?[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2):1-7,150.
- [15] 仇焕广,陈丹青,陈传波.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演化、现实挑战与施策重点[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4(6):3-12.
- [16] 邹一南.以人为本推进超大特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J].行政管理改革,2024(4):15-23.
- [17] 杨沫.推进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本思路与政策建议[J].经济学家,2024(9):109-118.
- [18] 彭大松.家庭化流动背景下老年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研究[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37(6):105-114.
- [19] 张国英,吴少龙.流动、保险与就医:基于老年流动人口的实证研究——兼论医保统筹的路径与目标[J].广东社会科学,2022,218(6):199-211.
- [20] 王家辉,吴正平.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困境及对策[J].中国科技产业,2024(6):47-49.
- [21] 陈英姿,赵玉港,胡亚琪.社会融合视角下中国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J].人口研究,2022,46(1):97-112.
- [22] 侯建明,李晓刚.我国流动老年人口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学刊,2017,39(6):62-70.

- [23] 吴菲菲,陈肖微,黄鲁成,等.老年人口流动对福祉技术创新需求的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19,39(22):191-196.
- [24] 熊萍,王利娟.流动老人的健康公共服务利用情况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21,476(18):24-26.
- [25] 吴迪,王友华,葛选,等.我国老年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利用状况及其影响因素[J].医学与社会,2023,36(3):43-48.
- [26] 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七号)[EB/OL].(2021-05-11)[2024-11-30].https://www.stats.gov.cn/sj/tjgb/rkpc-gb/qgrkpcgb/202302/t20230206_1902007.html.
- [27] 梁宏,郭娟娟.不同类别老年流动人口的特征比较——基于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分析[J].人口与发展,2018,24(1):94-108.
- [28] 段良霞,景晓芬.中国老年人口迁移特征及原因分析——基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J].老龄科学研究,2018,6(4):31-39.
- [29] 杨菊华.流动时代中的流动世代:老年流动人口的多维特征分析[J].人口学刊,2018,40(4):43-58.
- [30] 刘欢,席鹏辉.户籍管制与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基于2016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的经验分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40(11):82-95.
- [31] 任远,金雁,陈虹霖.多类型和具体文化制度环境下的老年人口迁移流动:一个解释性的框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2(4):143-155.
- [32] 段成荣,盛丹阳,吕利丹,等.迁徙中国视野下我国县域人口流动状况与发展挑战[J].西北人口,2022,43(6):1-13.
- [33] 汪晓慧,李剑波,杨洋.中国老年流动人口接受健康教育和建立健康档案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公共卫生,2021,37(2):203-208.
- [34] 夏屹.高质量建设老年友好型社区的新路径[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44(6):174-180,188.
- [35] 孟向京,姜向群,宋健,等.北京市流动老年人口特征及成因分析[J].人口研究,2004,6(5):55-67.
- [36] 杨菊华,卢瑞鹏.“漂老”与“老漂”:国内老年流动人口的研究进展与展望[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3(1):84-94.
- [37] 景晓芬.老年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及长期居留意愿研究——基于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J].人口与发展,2019,25(4):34-43.
- [38] 马健囡.市场回报如何影响务工型老年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基于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人口与经济,2020(4):53-67.
- [39] LITWAK E, LONGINO C F. Migration patterns among the elderly: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J]. The gerontologist, 1987, 27(3):266-272.
- [40] LONGINO C F, SMITH K J. Black retirement mig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gerontology: social sciences, 1991, 46:125-132.
- [41] RICK S, ZIMMERMAN, DAVID J, et al. Interpersonal and economic resources as mediators of the effects of health decline on the geographic mobility of the elderly[J]. Journal of aging and health, 1993(5):37-57.
- [42] CLARK W, WHITE K. Modeling elderly mobility[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1990, 22:909-924.
- [43] NEWBOLD K B. Determinants of elderly interstate mig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85-1990[J]. Research on aging, 1996, 18(4):451-476.
- [44] CLARK D E, HUNTER W J. The impact of economic opportunity, amenities and fiscal factors on age-specific migration rates[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1992, 32(3):349-365.
- [45] 高斯瑶,程杨.北京市老年人口迁移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J].地理研究,2018,37(1):119-132.
- [46] 周坚,何敏.社会医疗保险会影响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吗?[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7(5):57-64.
- [47] 易龙飞.流动老年人口生活状态与社会心态的多维度分析——以长三角地区为例[J].统计科学与实践,2021(5):9-11.
- [48] BERLIN K S, WILLIAMS N A, PARRA G R. An introduction to latent variable mixture modeling (Part I): overview and cross-sectional latent class and latent profile analyses[J]. Journal of pediatric psychology, 2014, 39:174-187.
- [49] 刺媛媛,闫妍,金姬,等.基于潜在类别分析的居民健康生活态度与行为变化阶段研究[J].现代预防医学,2021,48(2):292-295.
- [50] 郑瑞强,李剑富,郭如良.城乡融合视域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发展帮扶机制优化研究——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32-40.

Research on Group Segmen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 Identification of the Elderly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Context of New Urbanization

CHEN Juan, XU Yuanyuan, WANG Yumeng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aging, elderly migrant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Segmenting and identify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mobile population can help the government provide them with better social security and facilitate their adaptation to the new urban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2018 national mobile population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 this paper uses the LCA model to segment and identify subgroups within the elderly migrant population. On this basis, the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is further structured to analyze key driving factors behind the mobility of different types of elderly population to provide a basis for social security recommendation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he elderly mobile population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types: 1) 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 type. Characterized by being older, rural, in poor health, and with generally low household income levels, this group is the most vulnerable among the three, and their migration is largely based on mutual support between generations. 2) Economically driven type. Typically younger, rural, in good health, and with multiple children, this group demonstrates the strongest willingness to work or start businesses and migrates primarily for employment or commercial opportunities. 3) Emotionally dependent type. Mostly urban, with higher levels of education and household income, this group shows the strongest desire for emotional fulfillment and often migrates with their children for elder care and companionship.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social security of the elderly mobile population should be enhanced by ensuring the employment participation for elderly mobile population of the "economically driven" group, strengthening social support for the 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 type, and optimizing elder care services for the emotionally dependent group.

Key words new urbanization; the elderly population mobility; group segmentation; latent class analysis

(责任编辑:陈万红)